

国内出现百万低龄学生留学潮

核心提示

百万考生弃考留学

七月,就在中国考生、中考生期盼“金榜题名”时,越来越多的高中、初中生加入了“弃考一族”的行列。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今年预测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相关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波“弃考留学潮”的冲击力:今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不管是通过留学中介抑或直通车,还是以国际学校为跳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送幼小的孩子独自出国,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规划,也是一项巨大的风险投资。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富甚至中产家庭,依旧宁愿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送孩子走出国门接受国外的教育。

伴随中国幼童留学潮的是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于第一拨混迹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根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第三波移民潮正悄然兴起,其主力转移到了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上。为避免把孩子孤身扔在海外,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自己的监护下完成学业,举家移民成了这些中产家庭的新选择。

七月,正是千万中国考生和他们的家庭被大学录取的时节。

今年,却被去年那区区84万人的“零头”先声夺人,他们是“弃考一族”,无意去挤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更无须去赶“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悲哀远景。

84万人的数据,得之于这样的减法: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其中报名参加高考的为750万人。今年,弃考人数更可能突破百万。

6月中旬,高考成绩公布后,坊间对广州没出高考状元另类解释为,“状元出国了”。同时,人们也不时听闻重庆等个别学校,整班几十名学生同时出国上大学的消息。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公办重点高中,放弃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加。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发布的留学调查报告显示:出国留学学生当中,15岁到18岁占了近三成。

中国的人文传统奉行由“家”而“国”而“天下”,留学却剪出三者之间的一条捷径,有人通过它绕道高考,直插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背后;有人欲通过它跨越中西隔膜,跻身具有全球化品格的世界公民。

其实,中国第一批清朝留学生就可称是低龄留学。自1872年起的三年间,经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多在10至16岁之间。这些娃娃们肩负洋务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的期许,在当时的舆论看来却更像是一批赴夷夷之邦的苦差。

斗转星移,如今的出国留学已是人人欲得之的香饽饽,从公派转为个人行为,更有父母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世界名校的教育。

新东方教育的统计数据,自2003年以来,赴英美加澳读本科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占到了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五成。而自三年前美国高中教育对中国学生开放后,低龄学生出国留学达到近年来的顶峰。

综合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多家留学中介的数据,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铁了心要出国读本科的高二学生寇睿琦,已经寻觅一所美国高中的交换生机会多时。去年夏天参加“哈佛模联大会”巡游美国高校的记忆,还停留在她的鼻腔里:“你在校园,闭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样了。”

事先张扬的“弃考”

七月,校园操场上的野草还在兀自疯长,下一拨孩子接替前脚刚走的学长,也将迈入

“毕业班”的行列。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正焦灼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而高二学生则要“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挣扎。

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十一个班级,在这个暑假过后,将被分成两个预录取班和九个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试科目的不同,划分为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班级。

从那一刻起,同学们就将与大学的专业录取、未来的职业取向、乃至人生规划对号入座。也正是在这个时段,“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复旦附中教务处的徐老师说。

寇睿琦还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复盘这次期末考试,每当大家的答案相合,她都会大口喘息,作如释重负状。“睿琦,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虽然作为分班依据的此次考试结果,无以影响到她的高考起点,但这个女孩暗自较劲着“平均绩点”。申请高三赴美国高中交流学习,意味着由每一次平时考试牵动的平均绩点上,都会关系到国外录取考官对她的评价。

寇睿琦的书架已经打包干净,案头唯留一本被称为“红宝书”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词汇。在同一栋寝室楼里,有几张床位已腾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几位同学干脆选择了休学,踏上各自的出国求学之路。陈之间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国牛津大学。

据陈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绍,今年他班上45位学生中,已有4位先后休学,选择放弃高考,转而准备留学国外。而这一比例在年级中约占20%。“很自然,人往高处走,我们的尖子生都以美国长春藤高校为目标”。

校方的一组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放开高中留学以后,复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学生,最终被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国外高校录取。近五年来,每年都有10%左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报名参加高考。这一数据比上海市的平均比例高出了近三倍。

而在五年前,该校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还有零星的十来人,且多由公派或校企合作模式成行。

出国梦

寇睿琦的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她早就当上了“考试移民”。在高三分科的骨节眼,孩子却提出弃考留学的想法,让父母顺理成章的“复旦梦”破碎。

“如果不是来到复旦附中,我恐怕不会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寇睿琦说。这两年,不仅学前课后,常有国外的名牌高校前来设摊直

讲,每次一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架起一面面花花绿绿的校旗,“能不得看我们心旌招展么?”再加之耳濡目染校友的留学经历,其中有一位甚至以哈佛大学中国招生负责人的身份归来。

在7月3日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来自国外高校、留学中介和语言培训机构的人员,几乎齐声称“留学要趁早,高中刚刚好”。

新东方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机构、美国波士顿教育集团副总裁黄解释:以他们运作韩国学生赴美12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倾向不可逆转,将由目前的本科、硕士为主,扩展到中学阶段。

而一些及早行动的父母,更是四处打听出国读小学、初中的情况。新加坡因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学费每年1万元人民币),贴近华人社会的严格管理,和毕业后充沛的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小学生出国第一站。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逼近1/4甚至1/3,出国“分流”,成了又一脉主要的学生流向。

“剑桥中心”等社会办学的留学培训力量,加入到对优秀生源的争夺当中。以上海实验学校剑桥中心为例,一年级新生入学标准,只比去年的上海中考重点线低五到十分。

准备留学的低龄学生在常规教育以外,可选择的模式包括:“留学直通车”、国际学校和实验双语学校。

“留学直通车”,多是由办学机构与加拿大、澳洲的大学挂钩,以保证学生升学率,但这些高校的排名一般难以进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国际学校,则按照教育部规定,只能接收非中国国籍学生。号称以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为模板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针对中国本土学生的国际化教育机构,开始显山露水。

“公立学校目前在这一领域内,只能是望洋兴叹。”一位校长感慨道。在复旦附中的校园内,一枝月桂树之隔,



7月4日,一群学生在广州出国留学展上咨询校方代表。(资料图片)

便阻隔开了国内和国际部的教学方式。小班制教育的国际部讨论课上,国际学生为了净化汽车尾气的排放方案轮番登台,而寒窗苦读的应试者们则纠结于机关算尽的模拟试题。树下,能听到楼内操着多国语言的国际学生嬉闹奔跑;抬头,却望不到他们黑板上轻松开放的讲解。

陈之间等准备出国的学生,听说学校的国际部打算在近两年开办国际文凭课程(IB),曾想报读,但遭婉拒。

校长无奈地说:“像我们这样搞精英教育的学校,早就提出学生需要差异化培养。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课程能适应每一个孩子,让孩子能选择课程。但是,IB多好的一套课程,就因为历史课本对朝鲜战争的解读角度问题,公立学校一直没有获批使用。我们也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参照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三年后,国际教育机构将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办学力量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教育质量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人才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迹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今年高考平均录取率是62%,而上海的高考录取率接近九成。2009年84万弃考考生中有21%的人将要走上留学之路,在上海、北京等留学教育兴起较早的地方聚集,形成一个个隐于市的“弃考留学移民”群落。

据新华社



新闻时评

教改动真格 民众就会有信心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7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就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出5项要求,要求优先发展教育,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组织实施《教改规划纲要》作了全面部署。

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毫无疑问,这次会议可视为启动新一轮教改的总动员。

自今年2月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发布征求意见稿以来,怎样通过教改,进一步扩大公平、提高我国教育质量,就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而早在《教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座谈会上,温家宝就曾指出,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和学生关心的大事。《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

这点出了我国当前教育问题的要害——教改终归要挽回民众对教育的信心。

从更深层来看,这也是因为过去的经验造成家长对教育改革信心不足。而要令民众对教育有信心,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在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有真正的举措和实质性的突破。

客观上说,从我国《教改规划纲要》文本看,在改革考试招生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方面也确实有诸多亮点。对此,公众也期待在此次教育工作会议之后,能够看到清晰的实施路径。

比如高考改革,大家普遍存在的“纠结”是,在谈到应试教育对孩子个性、兴趣的影响时,都希望建立以高校自主招生为基本特征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制度。可是,真推行、落实这样的改革,却又面临公平、公正的担忧。

另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仅其中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这一环节,就已经遭遇既得利益者们的阻力。

此次,教育工作会议对这些热点和难点问题都没有回避。而对民众最关切的教育公平问题,《教改规划纲要》将其放在了第一位,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此次会议,亦提出要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令教师获得应有的尊严。这实质是唤起教育工作者自身的信心与热情。

而且对于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教改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过去十几年都未实现的目标,无疑显示了中央推动教育改革的决心。

在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是两大关键词。这次会议,意味着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教育进入实施、攻坚阶段,我们期待,新一轮的改革,能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动真格”,破除因循我国教育发展的顽疾,通过改革,增强民众对中国教育的信心,也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京文

官员重新任用的民意维度哪儿去了

据报道,广东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出面,说被记过处的官员,半年之后可以正常任用。这个话题,有点类似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尽管民众反应强烈,但一个又一个被问责的官员,还是接二连三地复出。连当初动静闹得特别大的石首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听说最近也复出了。从理论上说,只要官员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开除,都可以复出,这种做法在现行制度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而,为何这种事还是一次次引起民众的情绪反弹?到底是我们的制度有什么漏洞,还是民众缺乏理性?

应该说,很少有人认为官员犯了错误,就该一棍子打死,从此永远不得翻身,永不叙用。在帝制时代,官员

错免职,也有开复一说,清代绝大多数官员,都经过不断开复,不断起用的过程。但在那个时代,官员对上负责,犯错是对上犯错,起复是按上面的意思起复,没有民众什么事。而今天我们的官员被问责,往往跟民意的呼声有关。很多官员的丢官,恰是因为民意汹汹,不可开交。上级为了安抚民意,才做出的决定。可是,罢免考虑了民意,为何起复不考虑民意呢?这显然不合理。

中国的官场腐败,是令民众愤怒,也令政府头痛不已的痼疾。官场腐败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官员任用的灰箱甚至黑箱现象。在制度上,多数官员任用,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没有过问之权,作为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媒体更是不能干预,连打听一下,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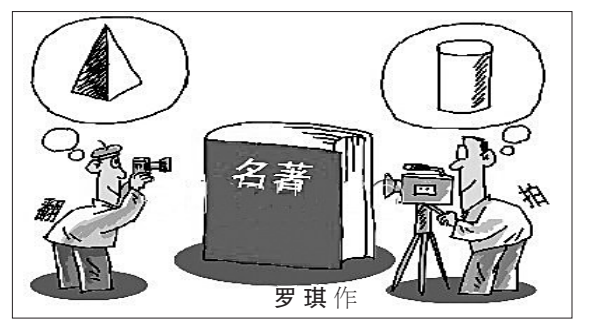
不被允许。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黑箱里的事情,让外界总是有很多猜想,当然不是好的猜想。关于被问责或者记过官员的起用,人们总是觉得政府对官员过于宽松,过于优待,对“自己人”太好。再联想到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官员的特权,人们没法心平气和。不是民众没有理性,也不是被问责官员个个十恶不赦。归根到底,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开、民众高度参与的起复程序,无论如何,官员的再任用,都会被质疑。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官员权力很大,担负的责任很大,民众对官员要求苛刻一点,理所当然。要想让民众理解官员,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阳光政治,让官员暴露在民众的视线之下。张鸣

新闻漫画: 同地同价



新闻漫画: 翻拍



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沦为乞丐 谁之过?

据腾讯网7月14日报道,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因为他大学毕业后回福建老家找工作,结果出来得匆忙,忘了带手机,而且“不小心”错买了前往南昌的火车票。来到南昌后,只剩几十元钱了。为了生存,到处找工作,但因为无法与人正面沟通,不仅没找到工作,甚至连要饭也不会。因为天气炎热和食用了霉变食物,最终沦为“乞丐”,倒在了大街……

我的天哪!初看报道,我以为又是某些人在搞什么行为艺术,早读新闻才明白,原来这一切是真的!

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使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沦为乞丐?

是他白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吗?一个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连乞丐都不合格,何其可悲也!

是他父母不会教育孩子吗?《三字经》云:养不教,父之过,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做父母的实在应该汗颜。

是他的母校没有教育好学生吗?应该是也。空有名校之壳,而无名校之精髓。这所名校盛行的学分制、导师制、论文答辩、素质培养等等一大堆

培养方法就是这样给自己的“产品”发学位证、毕业证吗?

他实在丢所有新世纪大学生的人!“毕业歌”唱得好“我们今天桃李芬芳,明天是祖国的栋梁。”这样一个个案岂非是对栋梁们的绝妙讽刺?

诚然,我们对这个同学不能“棒杀”,他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可塑性还很强。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行业标准不能降低,应该同样提高国际水平,由此给奶农或家境贫寒的消费者带来的困难,政府应该予以关切并进行适当补贴。考虑到将需要补贴的消费者搜寻出来未免太难,补贴奶农、降低奶农的生产成本,应该是目前阶段较优的政策选择。若因陋就简地降低行业标准,则政府不无推卸责任之嫌。苏振

近期颁布的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引发了舆论热议,主要的争议存在于“生乳安全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细分指标均低于1986年的国标,其中生乳蛋白质含量由1986年旧版生乳国标中的2.95%降到了2.8%,每毫升菌落总数从原来的50万放宽至200万——国外尤其是欧洲的该项标准是在50万以下。遂有舆论惊呼,“这简直是一夜退回25年前!”

制定行业标准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如何看待标准的下降,专家的解答是:第一,质量标准降低,是因为目前我国奶牛饲养水平普遍较低,如果标准提高到欧洲水平,广大奶农所提供的产品将很难达标;第二,通过奶厂的再加工,终端产品的质量标准将有所提高。故而,新近出台的这行业标准是从目前我国生乳生产的实际出发来制定的,这与三聚氰胺没有关系。

目前行业生产水平总体偏低,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沉重事实。然而,是不是就应该如此“因陋就简”来制定行业标准呢?依据这一标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表示,他不认同“蛋白质含量低不影响终端产品质量”的说法,他解释说,如果前期收购的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乳制品出厂时蛋白质含量要达标,就要再添加允许使用的天然蛋白一类的蛋白质,这好比“一个天然美女和整容的美女,虽然都是人,但还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看法,这一标准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对消费者而言总是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不一定是致命的。

放松标准,体现了主管部门为广大奶农生计考虑所饱含的善意和深切的同情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但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是明显的,如此一来,中国的奶制品将坐实“质量不高”至少是“质量不完美”的名声,国际市场对中国奶制品的评价,不免迅速降低。尽管主管部门基于善意的动机,希望放松标准来维护广大奶农利益和行业的发展,但当标准降低后,整个行业的产品将集体陷入低水平的困境,遑论行业的转型升级?长期来看,这对行业的发展是好是坏,自不待言。我想经济能力稍微过得去的消费者,从此不会再购买国产奶粉,国产奶粉的消费者就只会是那些低收入

的贫寒家庭。在目前行业发展的现实之下,如果提高行业标准,一方面广大奶农将可能破产,另外,终端产品价格就会上升,贫困家庭将买不到低价奶粉。但这一困境是可能打破的。食品是最重要的民生产品,倘若因市场自身很难克服的原因,导致食品价格高企,进而影响到民生时,政府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行业标准不能降低,应该同样提高国际水平,由此给奶农或家境贫寒的消费者带来的困难,政府应该予以关切并进行适当补贴。考虑到将需要补贴的消费者搜寻出来未免太难,补贴奶农、降低奶农的生产成本,应该是目前阶段较优的政策选择。若因陋就简地降低行业标准,则政府不无推卸责任之嫌。苏振